

博士后 视野下的中国经济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POSTDOCTORAL
PERSPECTIVE

史丹◎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博士后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POSTDOCTORAL
PERSPECTIVE

■ 视野下的中国经济

史 丹◎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士后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丹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096-5675-4

I. ①博… II. ①史…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8093 号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王纪慧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16

印 张: 20.25

字 数: 45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5675-4

定 价: 9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史 丹

编委会委员：史 丹 李海舰 张其仔 周文斌 王燕梅
李 钢 刘建丽 梁泳梅 覃 毅 姚 鹏
王海兵 许 明 杨宏静 赵静怡

主 编：史 丹

副 主 编：李海舰

□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博士后流动站成立于1995年，分为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两大学科。截至2017年，累计有190名博士后在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流动站工作，目前在站49人。从2015年起，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博士后流动站开始举办全国性博士后论坛，并得到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有关院校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论坛吸引了众多博士后关注，每届与会人数100多人，会议论文80篇左右。本论文集是从三届全国博士后论坛近200篇会议论文中选出来的部分论文，故本论文集以“博士后视野下的中国经济”为题展开。

2015年，工经所博士后流动站以“中国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届产业经济学博士后论坛。本论文集收集了本届论坛7篇会议论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效率、效益与产业结构等方面，这也是产业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一文研究了近年来外贸减速的原因，作者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变化，发现中国外贸减速更可能是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结果，是价值链升级后贸易统计“虚高”弱化的结果。《服务业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的分析》则通过分析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现服务业开放对促进制造业出口具有正向效应，其作用机理主要是生产能力效应、质量升级效应与产品种类效应等。《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兼议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转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市场导向型外资相对于成本导向型外资，其替代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品牌研发、营销渠道等价值链环节往往成为外资与内资激烈争夺的主战场，外资进入与兼并行为“扼杀”了一批中国的民族品牌及领军型企业，导致其原本构建的国内生产配套体系瓦解。中国应采取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政策，取消市场导向型外资的优惠政策，适当鼓励成本导向型的外资进入，加强反垄断，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市场扩张及技术兼并行为。《建议零售价、消费者偏好偏离与转售价格控制》一文从消费者品牌偏好分析了国内外产品定价差异的市场因素，研究发现，相对于本土零售商，在华跨国制造商习惯性运用建议零售价增强不当偏好，采用尚未被中国规制当局纳入规制范围的建议零售价等信息发布机制，增强消费者的不当偏好，直至以“不当偏好”实现其预设目标。该文建议不仅需要规制在华跨国制造商的RPM行为，而且需要规范跨国制造商产品信息发布机制，如禁止在华跨国制造商在产品尚未实际销售前，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二三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的实证分析）》从产业的贸易程度分析了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差

异的原因,指出提高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改善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状态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中国工业企业迁移:现象、动机与效应》研究了配置效率对企业迁移的诱惑,同时发现影响配置效率的因素并不是企业迁移,而是迁出地与迁入地影响效率因素差异。《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效果评价》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利用生态足迹方法研究资源利用效率问题,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常常面临着较大的生态压力,但通常都较好地利用了当地的生态资源,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生态压力较小,但资源利用效率也较低。

2016年,与安徽大学合肥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在合肥以“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区域经济”为主题共同举办第一届区域经济学博士后论坛。本论文集收集了本届论坛5篇会议论文。其中,有2篇探讨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2篇探讨公共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与作用,1篇研究人口迁移趋势与空间分布。这些论文研究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影响生产力布局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二是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是什么。《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协同发展》一文认为,企业集团功能单元布局对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并以京津冀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企业集团的形成及功能单元布局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势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公共政策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了吗?——来自省级数据的证据》研究发现,政府经济政策对工业空间集聚具有不同作用,对外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促进了工业集聚,财税政策对区域工业集聚作用则是负向的。《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进程研究:基于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再检验》发现,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本地区的环境改善是不确定的,因为污染存在较大的溢出效应,环境的改善需要区域内各地区协调进行,在污染治理上,需要地区合作,实施一体化的政策措施。人口迁移也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中国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发现,中国人口迁移由过去的乡—城迁移为主,向乡—城与城—城迁移等并存,新生代农民工是乡—城迁移人口的主力。流向主要集中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并有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城市一般是净迁出人口,人口净迁入的地区以东南沿海为主,人口迁移的活跃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行政等级具有密切关系。为了促进中小城市发展,政府需要发挥“逆向”调节作用。《经济集聚、税收竞争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则探讨了地区政府税收竞争与税收努力程度的影响因素、经济集聚的相对水平,即影响地区排名的因素是地方政府采取税收竞争手段的重要因素。

2017年,与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海口以“新经济与管理理论创新”为主题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工商管理学博士后论坛。本论文集收集了本届论坛5篇会议论文。这5篇论文主要研究企业管理人才、制度变迁及公司治理效率、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问题。《企业并购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效应:一个文献综述》一文,通过对企业并购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效应的现有文献分析,发现企业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项目盈利能力、内部现金流以及资本结构,还与管理者决策心理以及资本市场现状密切相关,揭示了主体心理特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解释了某些经典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是给出纠正投资扭曲的途径,如加强投资者理性教育,加强外部监督,优化投资者结构等。《制度环境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经验证据》一文,通过对全球191个国家的

数据分析,发现法律制度完善程度、社会包容性以及公平政策和民主自由权利、政府工作效能提升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积极作用,无论是政府效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以及腐败监管等正式制度环境,还是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环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国家环境质量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在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上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美产业人才开发组织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一文指出,人才结构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是一种协同演化发展的关系,并借鉴美国模式,提出完善中国产业人才开发组织模式的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完善各类组织建设,增强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平等关系,形成人才自组织的框架与运行模式。《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一文以江苏苏南为例,分析了民营经济演变、发展的内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制度质量的提高、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领域的配置程度具有显著的作用,尽管该文的实证指标的设计可能会有异议,但是其研究结论还是有意义的。《集团控制特征、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代理成本》一文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治理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却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原因可能与公司两权分离有关。

三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得益于工经所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学人》三个编辑部为论坛评选优秀论文所做的工作。工经所博士后流动站杨宏静、赵静怡为论文集出版做了许多联络工作,李海舰副所长协助我做了许多工作,工经所办公室的其他人员积极配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特别鸣谢安徽大学、海南大学对工经所工作的大力支持。

史丹

2018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目 录

产业经济篇

中国工业企业迁移：现象、动机与效应	郭晓丹 张 良 (3)
建议零售价、消费者偏好偏离与转售价格控制	李世杰 蔡祖国 (19)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效果评价	王俊杰 (38)
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	戴 翔 (59)
服务业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的分析	周霄雪 (78)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二三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STR) 的实证分析	李芳芳 (96)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	
——兼议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转型	黎 峰 (108)

区域经济篇

公共政策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了吗？	
——来自省级数据的证据	李世杰 宦梅丽 韦开蕾 (129)
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协同发展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视角	余 剑 陶娅娜 (149)
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进程研究：基于空间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的再检验	马丽梅 史 丹 (164)
中国人口迁移的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	王 宁 (180)
经济集聚、税收竞争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	邓 明 魏后凯 (194)

企业管理篇

企业并购中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效应：一个

文献综述	李井林 周献敏 杨 超 (219)
制度环境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经验证据	余泳泽 (230)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	程俊杰 (263)
中美产业人才开发组织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张延平 (286)
集团控制特征、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代理成本	谭玥宁 (297)

产业经济篇

□ 中国工业企业迁移：现象、动机与效应

郭晓丹 张 良

摘 要：本文应用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迁移的现象、动机及迁移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区域和行政级别作为企业迁移划分标准，对 10 年间工业企业迁移现象进行了微观刻画，利用 DOP 方法进行生产率分解以解释企业迁移的动机，并采用 PSM-DID 方法对迁移行为的净效应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企业迁移的动机源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而企业迁移的净效应显著为负，迁移企业在样本期间生产率的绝对增长由迁移行为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决定。基于研究结论，探讨了企业迁移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企业迁移；生产率分解；准自然实验

一、引言

企业空间动态研究是从微观视角研究区域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从企业进入、退出和迁移等空间动态出发，分析空间经济的结构及其变化（Van Dijk & Pellenbarg, 1999）。企业进入和退出是企业空间动态研究的关键事件，通过研究企业更替、成长和衰退的进程来探讨产业的演化。与企业进入退出不同，企业迁移并非企业周期循环的一部分，从空间视角上迁移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再分配，企业的迁移能够带动资源的重新配置，推动区域内、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企业迁移成为产业动态的重要环节。

企业迁移主要指企业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转移，包括区域内迁移、跨区域迁移和国际迁移等迁移路径（Pellenbarg, 2002; Mariotti, 2002），本文对于企业迁移的研究主要指企业的跨区域迁移，不考虑市区内和市内区县间的区域内迁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活动，本文基于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12032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203023）。

作者简介：郭晓丹，博士，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结构、产业动态、产业政策。张良，硕士研究生，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动态。

政级别对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跨区域迁移企业进行识别。迁移的方式一般分为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魏后凯，2009）。整体迁移指整个企业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他区域；而部分迁移主要指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他区域，而其他活动仍保留在原来区域，如企业总部迁移、生产部门迁移等，本文只对整体迁移的企业进行研究。

企业迁移的理论框架经历了从新古典理论、行为理论到制度理论的演进过程（史进，2014）。一般认为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新古典理论认为企业迁移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强调了企业对最优区位的选择，虽然制度理论强调了制度因素对于企业迁移的影响，不过企业始终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经济因素依旧占有主要地位，而行为理论强调内部因素（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占主导地位。现有文献对于企业迁移绩效的评价相对较少，Bhabra 等（2002）利用微观数据对企业迁移后股票价格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迁移的动机是迁移效果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他们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尝试从宏观角度解释企业迁移的动机，并对企业迁移前后的绩效差异进行考察。在进行相关数据处理之后，得到迁移企业共包含 1998~2007 年统一口径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数据样本企业 304 家、样本观测值 1847 个；利用 DOP 法对迁移企业进行生产率分解，发现企业在迁移前的生产率变化主要源于企业自身成长，而在迁移后生产率变化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们认为追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推动企业实施迁移决策的主要原因。为考察企业迁移前后的差异，本文对企业迁移建立准自然实验，应用 PSM-DID 方法分析企业迁移行为的净效应，结

果显示，企业的迁移行为并未实现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显著提高。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城市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大城市给企业带来的资源也更加丰富，企业更倾向于迁往大城市发展。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大多数迁移企业的迁移方向为由低到高，即由小城市迁往大城市或由低行政级别城市迁往高行政级别城市，通过生产率分解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追求资源配置效率而集中于大城市或高行政级别城市。对于企业的迁移行为并未实现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提高，即企业迁移的净效应为负，原因或许并不单一，企业迁移以后需要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或产业政策，因此企业迁移对于企业自身的增长作用可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

二、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研究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范围主要在于寻找推动企业迁移的原因，在企业迁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诞生了几种重要的企业迁移理论流派，如新古典区位理论、行为理论、制度理论等（Hayter，1997）。这些理论均建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以探讨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新古典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上，企业家是完全理性的，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多地关注最优区位的选择，认为促使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是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行为理论认为企业家是在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条件下决策的“满意人”，对于企业迁移的决策，管理者不能把所有的途径和结果都考虑到，该理论强调“合适行为”而非“最优行为”，更多地强调了企业内部因素（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对于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制度

理论认为企业迁移不仅要考虑决策行为本身，还要考虑社会和文化内涵，并加入了工会、政策等因素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关于企业迁移影响因素及动机的经验证据方面，从数据来源看，国内外学者通过对迁移企业的案例进行分析或者采用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以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数据作为支持，研究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以及政策制度等对于企业迁移的影响。部分学者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研究不同因素对于迁移行为的影响。Pen（2000）基于1100份企业问卷调查和50次企业访谈研究了荷兰企业的迁移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企业迁移决策是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内学者陈建军（2002）基于问卷调查形式以浙江省105家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指出企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原因。王思文和管新帅（2013）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程度，小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企业年龄较大和较小的企业相对中间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而处于较好的市场基础设施条件下的企业迁移动机较低。杨菊萍和贾生华（2011）利用2000~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的116次企业迁移的相关报道识别促使企业迁移的各种动因，结果表明政策动因最重要，然后是战略动因和经济动因。从研究方法看，应用计量方法研究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成为主流，Van Dijk和Pellenbarg（2000）使用有序Logit和Probit模型对荷兰企业进行研究，指出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企业的内部因素（经济部门、企业规模）决定。Brouwer等（2004）利用Logit模型对21个国家的企业迁移行为进行研究，指出企业的迁移意向随着企业的规模而减弱，随着企业的年龄而减弱。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

较高的沉没成本，而年龄较大的企业则更深地融入当地的空间环境中。从研究结论看，对于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动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研究结论呈现出一定的差异，Cohen（2005）强调了企业的外部因素对于迁移决策的影响，如政府决策、区域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等。而Lee（2008）则发现美国州政府的发展政策对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很弱。刘力（2008）认为生产成本和产业转移政策是影响企业迁移的重要原因。魏后凯（2009）指出了影响企业迁移的外部因素包括迁移目标当地的资源、产业升级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等。Cull等（2005）对中国18个城市约2400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倾向于选择合约履行过程中产生冲突时解决机制较优的城市作为迁移目标。Van Dijk和Pellenbarg（2000）认为企业的内部因素影响企业的迁移决策。王思文和管新帅（2013）则利用微观数据库强调了企业内部因素是影响企业迁移的主因。

关于企业迁移绩效的评价方面，现有文献对企业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决定动机上，一般以迁移企业的案例进行分析或者采用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以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数据作为支持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对企业迁移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但缺乏对于企业迁移行为的效应方面的相关研究。Manning等（1999）、Bhabra等（2002）通过微观数据对企业迁移后股票价格的实证分析，指出迁移动机是迁移绩效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三、基本事实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建立

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期间为1998~2007年。该数据库主要来自样本企业提交给当地统计局的季报和年报汇总。该数据库的全称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其样本范围为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其统计单位为企业法人。这里的“工业”统计口径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门类，主要是制造业（占90%以上）。“规模以上”要求企业每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2011年该标准改为2000万元及以上。该数据库作为一个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库，它的优点是样本大、指标多、时间长，但同时存在样本错配、指标缺失、指标异常、样本选择和测度误差和变量定义模糊等诸多问题（聂辉华，2012）。Brandt等（2012）对该数据库做了详细的整理，他们的研究也成为处理该数据库的代表性成果，本文处理面板的基本思路是结合Brandt（2012）和杨汝岱（2015）的处理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

本文主要探讨基于城市行政级别的企业迁移的动机及其迁移前后绩效的变化，故分析样本为1998~2007年10年间发生迁移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第一步，通过法人代码进行匹配；第二步，通过企业名称进行匹配；第三步，通过地址代码和电话号码进行匹配；第四步，通过法人代表名称、行业代码和成立年份进行匹配。匹配的原则是每一步一定存在可以唯一表示某家企业的标识。经过匹配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共包括了50多万家企业200多万个观测值。文献中将迁移的方式分为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部分迁移包括建立分厂、迁移总部及研发

部门等（魏后凯，2009），也有将转包合同作为迁移方式的分类（Bianchi & Mariotti, 2003）。由于企业扩张作出的部分迁移以及转包合同等迁移方式本身情况复杂，而工业企业数据库用于区分迁移方式的变量局限性较大，不能明确定位以部分迁移等方式进行迁移的企业，因此本文只对整体迁移的企业进行研究。

本文直接对数据库进行处理，筛选10年间进行了迁移的企业，通过企业在不同年份登记的地级市区域代码以及通过对全国287个地级市进行行政级别划分来确认企业是否进行了迁移。为考察企业选择迁往较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动机及影响，因而筛选迁移企业只考虑跨级别迁移，不考虑市区内和市内区县间的区域内迁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活动。具体处理思路如下：首先对行政级别做分类变量赋值，正部级为1，副部级为2，正厅级为3，副厅级为4；其次对样本期间内每个企业相应的分类变量做算术平均处理，其值为小数时就可以认为该企业在样本期间内发生了跨级别迁移。

（二）迁移企业基本情况

经过上述处理后得到637家企业。对于在样本期间进行了多次迁移的企业，本文认为属于异常样本，经过剔除之后剩余551家企业，其中458家企业由低行政级别向高行政级别迁移，93家企业由高行政级别向低行政级别迁移。

从迁移企业的规模来看，按照我国在2003年制定的《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本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规模以上企业划分为大、中、小型三种规模的企业，并且采用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两种指标作为划分标准，从业人数大于2000人且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上的为大型企业，从业人数在300~2000人且资产总额在4000万元到4

亿元的为中型企业，其余的为小型企业。在 458 家由低行政级别到高行政级别迁移的企业中，包括 7 家大型企业、110 家中型企业、341 家小型企业，占比分别为 1.53%、24.02% 和 74.45%；在 93 家由高行政级别向低行政级别迁移的企业中，包括 8 家大型企业、32 家中型企业、53 家小型企业，占比分别为 8.60%、34.41% 和 56.99%。总体来看，迁移企业中大型企业占比 2.72%、中型企业占比 25.77%、小型企业占比 71.51%，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全部企业进行规模划分，得到大、中、小型企业比例分别为 0.95%、10.55% 和 88.50%。由此可见，在迁移企业中大型和中型企业所占比例均高于全国相应比例，

而小型企业所占比例低于全国比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大型和中型企业能够承受更高的迁移成本，又或是大型和中型企业更倾向于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

本文将迁移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从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看，国有企业包括登记注册类型为 110、141、143、151 的企业，其余均为非国有企业。458 家由低行政级别到高行政级别迁移的企业包括 159 家国有企业和 299 家非国有企业，占比分别为 34.72% 和 65.28%；93 家由高行政级别到低行政级别迁移的企业包括 23 家国有企业和 70 家非国有企业，占比分别为 24.73% 和 75.27%（见表 1）。

表 1 迁移企业规模及注册类型

		企业规模			企业注册类型	
由低到高迁移企业	企业总数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企业数（家）	458	7	110	341	159	299
占比（%）	100	1.53	24.02	74.45	34.72	65.28
由高到低迁移企业	企业总数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企业数（家）	93	8	32	53	23	70
占比（%）	100	8.60	34.41	56.99	24.73	75.27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纺织、服装皮革、食品饮料加工、家具、橡胶塑料、木制品、纸制品、冶炼产品等中低端产业的企业更

多地进行整体迁移，其比重约占迁移企业总数的 67%（见表 2）。

表 2 迁移企业行业分布

单位：家

行业	企业数	行业	企业数
采矿业	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3
食品加工与制造业	6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8
烟草制品业	2	金属制品业	19
纺织业与纺织服装业	38	通用设备制造业	2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5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3	汽车制造业	29
家具制造业	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8
造纸和纸制品业	1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1	仪器仪表制造业	21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6	其他制造业	9

续表

行业	企业数	行业	企业数
医药制造业	2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2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0
电力、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	化学制品与化学纤维制造业	43

对经过匹配后的数据库进行重新处理, 目的在于筛选出合理的样本进行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测算, 针对工业企业数据库指标异常的问题, 参考现有文献 (聂辉华等, 2012; Cai 和 Liu, 2009), 剔除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固定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净值、工业增加值等变量缺失、为负值、为零值的样本, 剔除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的样本, 剔除从业人数缺失和小于零的样本, 剔除主营业务收入小于 500 万元的样本。本文研究的是制造业样本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13 ~ 43 类), 行业层面考虑两位数行业分类, 按照两位数行业分类, 矿产、石油等行业不适用于现有方法对 TFP 的分析, 由于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这些行业的生产函数不能简单假设为 C - D 生产函数 (杨汝岱, 2015)。因此剔除矿产、石油等资源性行业 and 水电煤气生产供应等行业, 只对 30 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样本进行讨论 (不含大类 38)。经过上述处理后得到 30 个 (两位数) 行业制造业企业的有效观测值约 187.89 万个。相应地经过处理后得到迁移企业的有效数据样本企业共 304 家、样本观测值 1847 个。

四、企业迁移的动机——基于生产率分解的解释

(一)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生产率分解的方法

1.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变量的选取

(1) 工业增加值。采用以 1998 年为 1

的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的工业增加值作为各个企业实际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库没有报告 2001 年与 2004 年的工业增加值, 对于工业增加值缺失值的处理, 参照刘小玄和李双杰 (2008) 提出的处理方法, 即工业增加值 = 产品销售额 - 期初存货 + 期末存货 - 中间投入 + 增值税。

(2) 企业的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企业的资本存量作为 OP 法所用的实际资本存量, 即实际投入生产的固定资本存量 K_{it} 的计算方式如下:

$$K_{it} = K_{it-1} + I_{it} - D_{it}$$

方程中各项处理方法如下: 依据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各个企业 1998 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企业的初始资本存量; 对数据库中各个企业各个年份的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额, 采用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额的差值计算得到每个企业各个年份的名义投资额, 再利用以 1998 年为 1 的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名义投资额进行折算得到实际值; 折旧额则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各个企业的当年折旧额, 按照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 1998 年的实际值。通过以上处理方法可以得到方程中各项指标, 从而得到每个企业在各年份的实际资本存量。

(3) 劳动投入。将各个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作为企业的劳动投入。

(4) 中间投入。采用以 1998 年为 1 的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的中间投入作为各个企业的实际中间投入。

2. 行政级别的划分

本文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范围为地级